



名稱：彩繪鎮墓文殘石
上：中央真文 下：南方真文

金石材質：磚質

金石年代：約為唐代

入藏年代：二〇一七年

金石出土地：陝西

金石收藏地：浙江大學圖書館



浙江大學圖書館古籍碑帖研究與保護中心 主办

目 录

1、中心召开发展座谈会·····	1
2、图书馆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报告·····	3
3、《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即将出版·····	5
4、乾宁斋藏中医古文献整理保存合作协议在中心签定·····	6
5、图书馆 2017 年新购拓片概述·····	7
6、中心动态·····	9
(1) 中心启用新印章	
(2) “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公开发布	
(3) 中心派员参加“古籍整理与数字化论坛”	
(4) 康奈尔大学学者参观碑帖中心	
7、简讯 ·····	14
(1) 《宋词经典》系列学术视频在中心摄制	
(2) 读《大学》——古籍碑帖中心举办读书会（第四期）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简讯》 第10期

主编：黄 晨

编辑：韩松涛 高 明 程惠新 郑 颖 张焕敏 韩秀丽 范晨晓 应潇潇

地址：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南楼一楼

网址：<http://csid.zju.edu.cn>

邮箱：zdbtx@zju.edu.cn

中心召开发展座谈会

文/张微微 图/张巧灵



2018年1月24日下午，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发展座谈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古籍碑帖中心召开。与会的专家有人文学院胡可先教授、卢向前教授、孔令宏教授、徐永明教授、陈东辉副教授。古籍碑帖中心主任黄晨副馆长及中心成员参加了该次座谈会，会议由黄晨副馆长主持。

会议首先是古籍碑帖中心对近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高明就古籍工作进行了概述。古籍工作主要成绩是完成了古籍图书的普查工作，对70余种古籍通过调研进行了提善；已经出版了“国家珍贵名录图录”及“善本书目”；“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孙詒让稿本”、“善本书中的藏书印”等相关图书即将出版。韩松涛对近年来的碑帖购买等情况进行了介绍，本馆自2014年来，共购入拓片7批，共购入约5500余种，6700余张。拓片购买围绕了名人墓志、宗教、书法、宋代四个专题方向。拓片中约有5000余张已经完成了数字化。

黄晨副馆长对古籍碑帖中心的工作进行了总结，首先提出在资源建设上，中心将做更多的工作，比如与企业合作，将获赠一批原石（30块）；对专题的拓片进行整批的购买，比如陕西药王山等；由于人文学院宗教学研究实力较强，中

心也可以加入石刻造像题记作为拓片收集的主要主题等。其次，通过与人文学院冯国栋副院长合作为例，提出了从学术资源上全力支持学校相关学科发展的工作思路，并期望能在精品出版、馆藏资源研究等方面与人文学院进行深入合作。

随后各位专家就自己的领域和研究内容对中心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1、墓志出土位置以及墓志内容进行挖掘建立地理信息数据库。

2、除了陈馆保藏，可以考虑利用与研究问题，设立课题，扩大影响力。

3、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具有特色的冷门绝学，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收集专题；收集可以分专题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并重。整理重点；目前馆藏有墓志和摩崖拓片，可以整理出书并举办展览。出书可参考北大，一类型拓片目录，另一类型选拓片精品进行影印出书可考虑以书法为主线。研究多元；墓志盖或者周围都有些艺术图案，可以进行很多方面研究。

4、目前收集拓片量相对少，从收集角度来说，要有针对性，可以错位发展，比如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已经收藏的，我们可以规避。可以从华东五省入手收藏拓片。

5、人文学院佛道教研究比较充分，图书馆针对佛道教地下文献可以作为重点收藏。

6、碑帖、古籍是浙大图书馆亮点，收集购买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出版重要性。孙诒让稿本是我们重要特色。冠名对浙大图书馆很重要，可以变通办法分集出版，第一集冠名浙大图书馆。

7、考虑新书发布会形式，出的书统一 logo。

8、在古籍碑帖研究中心已有展柜基础上，增加展柜展示。

9、借鉴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做法，图书馆和学者联合把馆藏古籍做个调查，把别的图书馆比较珍贵且没有影印的古籍，可以做一套浙大藏珍本丛刊。

10、目前出版稿抄本趋势愈发火热，选题和书名很重要，要尽快整理出版，优势是可以自己署名，如“浙大图书馆藏稿抄本丛刊”。

最后黄晨副馆长对与会专家的意见表示感谢，并提出中心将在宏观发展思路的规划，资源的展览与出版等诸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并进一步开放合作，将中心的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图书馆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报告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



浙江大学图书馆自 2014 年 10 月启动可移动文物普查项目，历经 2 年多时间，先后共投入 156.908 万、20 余人，于 2016 年底完成本馆全部可移动文物的普查。

图书馆所藏可移动文物的类别包括古籍图书约 16.3 万册，石器砖瓦、雕塑造像、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钱币等出土文物共计 259 件（有 2 件因破损严重未登录普查）。

浙江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线装古籍主要来源是国立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的藏书，最早的入藏时间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直至六十年代仍在继续采购线装古籍。我校古籍以质量精善著称于高校图书馆，16 万余册古籍中，善本书占 2 万余册，其中宋刻本 1 部，乃 1986 年底袁涤庵先生的后人袁绍文等人所赠。另有元刻本 4 部，明刻本 700 余部，更有名家稿本、抄本及批校题跋本百余种，尤以孙诒让稿本、批校本最具特色。

浙江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出土文物，是由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于 1987 年 3 月调往浙江大学的。其中有新旧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有西周至南北朝各时期的陶罐、陶鬲、陶鼎、陶壶等等，有唐代典型的三彩马、三彩侍女俑、三彩天王俑等，还有商代的贝币、清代的铜钱，以及汉代的粮食等等。尤其值得珍视的是宋代耀州窑的一件青瓷碗和定窑的一件白瓷碗，胎薄而质坚，釉面光洁匀静，装饰图案秀丽典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图书馆由于所藏可移动文物数量巨大，普查任务十分艰巨。项目进行的第一年，经费来源只有省古籍保护中心下拨的 19.08 万元，所有普查工作皆由本馆馆员承担，虽利用周末及暑假加班开展古籍普查工作，但进度较缓慢，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仅完成逾 3 万册古籍的普查。2015 年下半年，学校下拨 126 万用于图书馆可移动文物普查，图书馆遂决定通过招标的方式，由本馆馆员及社会数据加工商共同合作用，力争在 2016 年完成全部普查工作。

2015 年 12 月 22 日，浙江大学图书馆可移动文物普查项目（编号 ZUPO-GK-2015104）公开招标，经过采购专家小组评审，杭州学是图书有限公司中标，其投标总报价为 117.828 万元。招标成功后，图书馆立即组织筹备项目的实施，并于 2016 年 1 月中旬完成了工作场地改造、人员的培训及其他配套设施的准备工作。在项目初期（至 2016 年 1 月至 3 月），古籍特藏部投入 3 名正式员工协助项目的开展，一人负责项目管理及古籍的进出库，二人负责数据审核。为了确保数据质量，此阶段的所有数据都由本馆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同时在审核过程中，从公司人员中遴选出 2 人作为审核员加以培养。

杭州学是图书有限公司实行单休，为了保证项目进度，古籍特藏部配合公司要求推行加班制度，鼓励馆员在双休日进行加班。寒暑假期间，古籍特藏部亦应公司要求，组织加班以保证普查项目的顺利开展，共计加班 37 天。加班制度的实施加快了可移动文物普查项目的进度，至 2016 年 9 月底，杭州学是图书有限公司总共完成约 10.5 万余册古籍的普查，加上本馆馆员完成善本书、医学馆藏古籍共 2 万余册以及之前完成的普通古籍 3 万余册，图书馆可移动文物普查项目已完成总进度的 90% 以上。

此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对浙江大学图书馆现存可移动文物进行了详细清点，对文物的品种、数量、级别等次、破损情况进行了调查、鉴定和记录，既摸清了家底，也为今后有针对性、有计划、科学规范地开展古籍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根据此次普查，图书馆所藏可移动文物完整程度良好。古籍部分，除了 15% 的古籍存在严重的鼠啮、虫蛀、封面缺损、酸化等破损外，大部分古籍保存完整。出土文物部分，有 17 件文物残缺，33 件文物基本完整外，其余文物都保存完整。

在保护条件方面，由于前几年在评选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时，图书馆对古籍书库进行过改造，所以古籍的收藏环境基本符合相关标准。但此次普查在古籍内部发现有活虫，这意味着需要对古籍及书库进行杀虫处理；部分古籍纸张酸化严重，尤其是民国古籍，一翻就碎裂掉渣，需要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另外部分古籍因缺少装具，积了厚厚的灰尘。出土文物在保护条件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多，这些文物不仅没有装具，也没有配备专用文物柜，而且目前的收藏环境在温湿度、空气净化、光线、防虫、防鼠等方面都没有达到收藏文物的要求，而文物本身锈蚀、缺损处也需要清理修复。

为了更好地保护馆藏可移动文物，避免灾害隐患，有必要对现有保存条件进行改善：

1. 改善出土文物的保存环境。可与古籍共用库房，将出土文物调整入古籍库房进行保藏。
2. 为出土文物配置专用文物柜，满足出土文物安全保存及展示的需求。
3. 为古籍与出土文物配置内装具：夹板和文物盒。装具有可移动、防挤压、防磨损和减少人体触摸等功能，在文物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
4. 购置杀虫设备。考虑到安全性，选用低温杀虫方法，用负 40 度医用冰柜进行低温杀虫。
5. 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维护。部分文物锈蚀严重改善文物保藏环境的同时也应该对文物自身进行必要的清理维修。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即将出版

文/郑颖

根据 2016 年完成的古籍普查数据，经过半年的校对整理，《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现已进入出版程序，将于 2018 年下半年正式出版，这是本馆古籍保护工作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囊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全部汉文古籍（版本截止于 1911 年）共 8820 余部、10.5 万余册，包括宋元刻本（含递修）15 部，明代刻印本 800 余部，清代刻印本 7000 余部，明清以来稿抄本 400 余部，名家批校题跋本近 300 部。其中最珍贵之善本书有 2 万余册、1800 余种，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共有 830 部善本入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包括原杭州大学 819 部，原浙江医科大学 11 部，入选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九，有近百种善本书为全国独家馆藏。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至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本馆又有 173 部善本古籍入选，入选数量在全国高校中位居第二。

该目所收之精华古籍主要来源于“嘉业堂”和“玉海楼”二大著名藏书楼以及专业学者、社会名流的个人收藏，其中较有特色的部分如下：

一、孙诒让稿本 21 种及孙氏父子批校题跋本百余种，既是孙氏父子治学的成果，也是研究孙氏父子学术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二、稀见珍本收藏甚富，除年代较早的宋元刻本外，所藏写本如清乾隆间文澜阁写本《钦定四库全书》残本，稿本如清李象坤撰《雁山志稿》，抄本如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龙洲道人集》、清内府五色抄本《劝善金科》，活字本如明铜活字印本《唐人集》，刻本如明成化十九年（1483）刻本《畏庵集》以及清人何焯、顾嗣立、何绍基等名家批校题跋本，皆属不可多得之珍品，或存世极罕，或为海内外孤本。

三、形成系列专题文献收藏，如以《嘉兴藏》为代表的佛教文献收藏、以胡士莹所赠小说戏曲古籍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收藏以及中医古籍收藏等。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得以编制完成，乃集众人之力，既离不开前人奠定的目录基础，也离不开学校和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以及本馆古籍编目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它的出版揭示了馆藏古籍之全貌，使更多人得以了解浙大藏书之丰富、文化积淀之深厚，对于推动浙江大学古籍整理、保护工作以及促进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乾宁斋藏中医古文献整理保存合作协议在中心签定

文/图 韩秀丽



2017年6月21日下午，浙江大学图书馆与浙江乾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签约仪式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顺利举行，图书馆副馆长黄晨和乾宁公司董事麻浩珍签署了乾宁斋藏中医古文献整理保存合作协议。图书馆和乾宁公司相关人员参加了签约仪式。

黄晨表示，乾宁斋藏中医古文献的整理保存合作计划，是浙大图书馆与乾宁公司合作的第一步，乾宁斋藏万余册中医古文献能够弥补馆藏中医古籍方面的不足，增加对学校相关科学的支持。期望接下来双方可以在展览、出版、数字化、特色库建设等方面开展更深入的交流，乃至扩展到中医古文献的海外合作。

乾宁斋创建于清朝咸丰年间。自创立伊始，乾宁斋便十分重视中医文化的传承，多方收集中医古医书，至民国时期藏书达两万余册，后在文革期间被烧毁一万余册，目前尚有万余本中医古文献得以保存。此次合作，既是对中医文献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也是浙大图书馆多年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延续和深入。

图书馆 2017 年新购拓片概述

文/韩松涛

2017 年图书馆新购拓片两批，分别为“陕西金石拓片第四批”和“洛阳墓志拓片第三批”，现简介如下：

一、陕西金石拓片第四批

图书馆 2014 年至 2016 年已经通过采购中心已经购入陕西、洛阳两地墓志拓片五批近 5000 张，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本次陕西金石拓片（第四批）是在前五批墓志拓片的基础上，扩展到了金文、名碑等拓片类型上，具有收藏转型及向更广阔的拓片收藏领域发展一次重要的资源收集，为今后图书馆金石拓片收集奠定重要的基础。此次图书馆拓片的购入除充实我馆的特色实体馆藏，还将增加对学校文史相关专业学术研究的支持力度。

本次购买的陕西金石拓片分三个部分，其中墓志拓片 292 种 402 张；金文拓片 40 种 54 张，宗教书法名人碑刻 62 种 86 张，共计 394 种 547 张。

本次购买三种类型的拓片，墓志已经是第六次购买，所以不再详细介绍。除墓志外，其余两种新的拓片类型是中心新开拓的拓片收藏领域。

1、金文拓片

古代镌刻文字、颂功纪事的钟鼎碑碣之属合称“金石”，古人曰：金，钟鼎也；石，丰碑也。赵明诚、李清照所撰的《金石录》仿欧阳修《集古录》而作，是最早以此为名的金石专著。

钟鼎现代称青铜器，青铜文化与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起源。青铜器上的文字称金文，在晚清发现甲骨文之前，历代以来金文是最早的古文字，在唐代的墓志盖中，就已经出现了金文篆盖的情况，可见金文的研究也是延续了一千年以上，并在当代成为一门较为独立的学科。

拓片的收藏，墓志虽是一个大宗，但称“金石”者，金文仍是不可或缺的拓片收藏品种。特别是金文记录了春秋战国以前的中国历史事件，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作为一个拓片的收藏单位，金石并收将是拓片收藏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所以在有了基础的五千张拓片后，中心以金文拓片作为一个新的收藏方向。

金文拓片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只拓录文字或平面器型的金文拓片，另一种是将钟鼎的器型以立体的形式展示，称全型拓。本批金石拓片的购入，也让图书馆收藏了第一张全型拓的金石拓片。

本次金石拓片的购入，是本馆由墓志向金石发展的一个契机，也就是从拓片收藏上说，补全了金石收藏中的一个重要类型——金文拓片。同时一批造像及名碑的购入，也将大大提升我馆拓片的总体质量。所以，可以说本次拓片的购入将是本馆金石拓片收藏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品种由单一走向丰富，拓片的总体质量得到提升。如果若干年后我馆的拓片收藏能在图书馆界有一定地位的话，本次收藏理念的调整和本次藏品的购入将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

2、碑碣拓片

宗教、书法、名人都是我们前面制定的墓志重点收藏专题之一，此次延伸到地上材料碑碣的收藏，是对相关主题的补充，或者说对碑碣拓片的收藏，我们是有选择地进行。

宗教专题是中心定下的墓志拓片重点收藏专题之一，宗教石刻除地下材料的墓志、镇墓文、买地券等之外，地上材料也较为丰富，主要是塔铭、经幢、造像记，以及各种宗教建筑修建或重修时的记事碑，这些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为印证，形成了很好的学术资源。较为有名的宗教金石合集，首推陈垣先生的《道家金石略》，当代以来，宗教金石碑刻的整理形成一个热点，以道教为例，近代来有北大王宗昱教授《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旅居美国的吴亚魁《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肖霁虹研究员《云南道教碑刻辑录》、山东师大赵卫东教授《山东道教碑刻集》等一大批宗教碑刻的整理成果。所以中心将宗教作为重点收藏专题之一的情况下，对宗教碑刻的收集也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选择。

书法和名人也是本馆重点收藏主题之一，对于一些较有名的书法碑刻或历史名人的纪事碑、神道碑等，精选一部分收藏，也符合提高拓片收藏质量的总体目标。

本次拟购买的碑刻拓片中，大部分都是宗教主题的碑刻——造像记，少部分为名人或名家书法碑刻，还有部分碑刻，身兼多个主题，如元赵孟頫《皇元孙真人道行碑》，宋仁宗篆额、欧阳修撰文的《宋范仲淹神道碑》，武则天《升仙太子之碑》等，都有较高文献或艺术的价值。

二、洛阳墓志拓片第三批

本次图书馆拟购买的洛阳墓志拓片分两部分内容。其中墓志及买地券共计 988 种 988 张，晋砖拓片 290 种 290 张，合计 1278 种 1278 张。

第一部分为江西一地的宋元买地券与墓志。这批墓券的购入有较大意义：一是宋代拓片是图书馆定下的主要收藏方向之一，此次共有宋代拓片 800 种左右，大大加强了图书馆的宋代墓券的收藏。二是加上此次的买地券，我馆共收有江西一些宋元买地券一千余种，这么大的关于一个地方的买地券集合已经可以作为一个专题研究材料集合，这将大大加强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力度。

第二部分晋砖拓片也十分重要。汉晋时期的文字砖按照制作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刻划砖，包括湿刻和干刻两种形式。一类是模印砖，模印砖铭中的文字有反写、有正写，有的则是正反写掺杂。该批为第二类，拓片中有历史年号，各体书法，贺词等，对历史、书法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较大价值，并且近 300 张的数量，也可以算图书馆补齐了这一拓片的品类。

中心动态:

中心启用新印章

中心新印章启用，由中心学术委员王宏源镌刻，篆书，印文为：“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



“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公开发布

图/文 韩松涛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座谈会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召开。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周和平，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司长张永新、副司长陈彬斌，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韩永进，国家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唐国宏，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主任安平秋等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古籍保护中心的负责人等 50 余人参加会议。浙江大学图书馆派韩松涛作为资源联合发布方出席了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中，国家图书馆联合了浙江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 6 家图书馆以视频的方式在线发布了古籍数字资源。这是本馆建设的“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首次公开发布，发布会上对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的介绍为：“在线发布各种墓志、拓片影像和数据 7000 余条。该数据库由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制作，将建成全球最完善的墓志数据库和最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此次发布会对提高“中国历代墓志库”的知名度，寻求多方合作，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中心派员参加“古籍整理与数字化论坛”

文/韩松涛



“古籍整理与数字化论坛”于 2017 年 9 月 28-29 日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由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下属古联公司联合主办，南京大学图书馆承办。主办单位的参会人员主要有南京大学图书馆新上任的程章灿馆长、史梅副馆长；南京大学文学院除兴无院长、刘重喜书记，及多位文学院教授；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辑及古联公司副总经理洪涛等。参会嘉宾主要是各高校相关文学领域的教授及各高校图书馆馆长或古籍部人员。南京图书馆副馆长、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全勤等人也出席了本次会议。参会的高校主要有北大、浙大、人大、复旦、山大、南师大、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师范、淮阴师范、苏大、东南大学等，中心派韩松涛副研究馆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特点是由古籍数据库生产部门——中华书局，数据库购买与管理部——各图书馆，及古籍数据库的用户——文学领域教授，三方联合对古籍数据库的建设与使用进行评价。会议上的很多内容对图书馆今后的工作有参考价值。

首先是中华书局提出，现在的数字出版分为五步，即作者——出版社——纸质书——古籍库——读者，在这个模型中，先是用传统的方法出成纸质书，再进行数字化制作，是一个“伪数字出版”，中华书局拟在 2018 年初推出“籍合网”，

一个网上出版的平台，希望作者直接在线编辑，直接产生数字产品集并直接提供给读者使用。其次，原 CBDB 王宏甦提出建设数字人文的基础设施，即数字人文的数据标准。第三，凤凰出版社副总编辑吴葆勤介绍了他主持设计和使用的古籍点校网络平台，在平台的支持下，点校的底本随时可以变更，突破了传统手工点校的限制，将会极大地改变传统的点校工作。第四，南京大学史梅副馆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武秀成教授等专家学者对现存的古籍数据库，比如爱如生系列、中国基本古籍库、书同文系列，鼎秀、雕龙等，进行了从用户角度，管理者角度等视角的分析与评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演示 RTI 扫描技术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心韩松涛副研究馆员作了即兴发言，对我馆主持的 CADAL 项目在数字人文和古籍数字化中的探索和成绩作了介绍，主要内容是：

1、针对大家推崇的哈佛燕京公开所有古籍善本的行为，指出 CADAL 与北美很多东亚馆进行了古籍数字化合作，CADAL 实际上为全球古籍数字化作出了贡献。2、介绍了 CADAL 在数字人文方向上的探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与哥大的门神画像联展为例，介绍了 CADAL 在高清图像的扫描、传输和打印输出方面的实践，二是介绍了 CADAL 在 RTI 扫描技术上的实践，并在现场演示了我馆扫描的部分成果，包括钱币和墓石的 RTI 扫描结果。3、以陈红民蒋介石专题数据库为例，讨论 CADAL 向专题库特色库发展的方向。引起与会人员的兴趣与关注。

美国康奈尔大学学者参观碑帖中心

文/凌妙丹 图/张巧灵

2017年5月2日，美国康奈尔大学副研究员 MICHELE E. BROWN 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副研究员同时也是西文文献修复与保护专家 PATRICIA. ANNE. FOX 到访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古籍碑帖中心，馆员韩秀丽陪同参观。两位学者对中心的金石碑帖特藏，蕴含中国古典元素的文化空间设计等大加赞赏，并合影留念。



简讯：

《宋词经典》系列学术视频在中心摄制

文/图 凌妙丹



2017年3月7日,《宋词经典》系列学术视频中的两讲《宋词渊源-花间词》、《苏轼词》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古籍碑帖中心拍摄录制,主讲人分别是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可先与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学研究中心主任陶然。

“花间词”因《花间集》(五代十国时期赵崇祚编纂,我国第一部文人词集)而得名,是一种早期的词,词风绮丽婉约,具有可歌的音乐性、美感的女性化、功能的娱乐性、崇雅的文人性四个特质。花间词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它开创了“词”这一文体,使之区别于诗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可以说是宋词渊源。“花间派”的首要词人温庭筠被称为“花间鼻祖”,留下了《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等经典名作。

苏轼的词,在文学史上同样地位显著。不同于花间词大多为代言体,词作者将自己置于歌女的角度遣词用句,具有音乐性、娱乐性较强的特征;苏轼词更多的是自言体,反映文人自身的风格面貌,既有词人的言情又具诗人的言志,文学性、表达性更为突出。因而有观点认为,苏词是词走向文学化、文人化、经典化的起点。

读《大学》——古籍碑帖中心举办读书会（第四期）

文凌妙丹，图张巧灵

2017年5月11日，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永明与其博士生、硕士生一同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古籍碑帖中心举办读书会。本次读书会的主题为《大学》。



现通行的《大学》有两个版本，一是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二是经南宋大儒朱熹编排整理的《大学章句》本。读书会将此两种文本进行比较，结合学者的研究文章对《大学》做了深入的探讨。

不同的学者对文本的阐述不尽相同，朱熹与王阳明对《大学》中部分语句的解释就存在分歧。较为典型的一例是“亲民”与“新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或作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将《大学》定为《四书》之首，并将《大学》古本中的“亲民”改为“新民”。明代王阳明则质疑朱子学的权威，认同《大学》古本，将“新民”重新改回“亲民”。读书会成员在会上讨论认为：可能亲民更能体现儒家民本的思想；而朱子将“亲民”改为“新民”，或意为“新的民众”，有力求改革的意图，亦颇有教育者之姿；再者，“亲”改为“新”是否有版本学上的依据，也有待考究。

程朱理学与阳明学的不同，还体现在对“格物致知”、“大学即为大人之学问”的解读等等，与会人员也做了相关探讨。